

我“而立”之年改行学写小说，“而今”归入耄耋行列也还没有封笔，没有放弃世俗的快乐。不免不断有人打听小说的信息，我也总回答。不过都回答了什么，现在也记不清了，有可能有时背两句古书：“街谈巷议，道听途说”。有时查了辞书：“叙事性的文学体裁”，“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”。也会“志怪”、“轶事”、“传奇”、“话本”地数落一通。

有些场面却又不时想起，这种想起称得起回味，因为是一种味道值得回一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活动兴大讲座，做大报告，有大面积的业余爱好者——先前叫“发烧友”，很后来才叫“粉丝”。此时的景观：文学小道上拥挤得走不起来。

一天，“发烧友”们包围了我，风雨一般提问：“为什么写作？为什么写小说？”

我匆忙回答：“生存在状态。”

鼓掌。

我私下肯定一下自己的脱口而出，算得基本上真实。至少没有特意的忧国忧民。

好像来不及眨眼，这个发烧的场面消失了。小鸟一去不回来。转身已是世纪末。我有一段记载：



1936年，我在浙江海宁农村小学毕业后因没钱继续升学，经父亲找朋友介绍，14岁时来到上海虹口区济宁路口的华文印书局当学徒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鬼子冲进了租界区，工厂被迫关闭。工人们各奔东西，有的回乡下，有的做小生意，更多的人流落街头，为生计而苦苦奔波。1942年1月的一天，装订间的工友谷福康来找我，说：“现在需要人到敌后去做抗日工作，你想不想去？”我一听是打东洋人的，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我一定要去，并急切地问：“什么时候去？怎么去？”他告诉我，这是秘密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，时间是明天下午3时整到十六铺码头找他，还有别的工友一起去，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说话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到达，见到了谷福

绝活

林斤澜

“千禧之夜，北京的同行随意走到一个茶艺馆里，坐到半夜，听听百年也是千年之交的钟声，鼓了鼓掌，各自回家。……”

倒是三三五五，聊天聊得嗡嗡的有情有绪……凑巧这个时刻不同寻常，就难免来几句瞻前顾后的零碎，可以记其大略。

文学没有多大意思了。

什么什么文学刊物，也改成了文化刊物了，改成文娱了，改成语文刊物掏学生兜儿去了……

小说不招人了，中文系的教授也不看了。圈子里的你不看我的我也不看你的了。快要看的人不如写的人多了。……”

先抄到这里。今年是零七年，我日益老耄，也就是逐渐封闭。偶然旁听“论坛”，满耳朵都“机灵”不过来。好比有人把文学和垃圾并提。要是“边缘化”，不入主流就是了。要是“个性化”，索性做做个人癖好去休，偏生垃圾，不仅废物，还是公害。

有人说声光化电，挤掉了阅读。从来“床上读书的兴趣”，现在只剩下“床上的兴趣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眼见文学小道上拥挤。千禧之夜，耳听文学没有多

人，为什么不，什么也为不了，只会“贴”到艺术上，写出真正的小说。

“你看，小说的出路在无出路”。

这话是在“乡下人的微笑中”“细声细气”出来的，让人都想象不到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掷地有声气壮山河。

果然，带出了学生汪曾祺，他才出山就“呼唤新艺术”，唤到：一种“思索方式”。一种“艺术形态”。一种“智慧模样”。

要是嫌这调门高了点儿，那世俗上有叫做“绝活”的，和“绝唱”，“绝响”，“绝色”做队。慢着，也可以和“绝望”，“绝命”，“绝种”相伴。让他去吧，多样总比一样好。老是“而立”之年和“而今”之世的攀比，去休，不用斤斤计较，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吧。

不过这里说的“绝活”，是“文学乃绝处逢生之学”。

文学小道上剩下几个

中国人常说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”



学会交友

郭树清

美国人林肯说：“人生大部分跟友谊有关。”英国人史文诺顿说：“十个人有九个因交朋友而进步。”西班牙人赛万提斯说：“重要的不在于你是谁生的，而在于你跟谁交朋友。”朋友在社会活动中无疑是重要角色。有人把朋友称为良师益友，视为无形财富，言之有理。在竞争激烈的现今社会，那些能与人建立起真挚友谊，朋友对他帮助的价值往往不可估量。

友谊与爱情不同，它不是亲情，而是一种平静的相互依恋，是会心的精神交流。知心的朋友对自己在精神上是一种慰藉，可以得到人生的快乐，在思想道德、事业上经常得到帮助和勉励。多一个朋友多条路，这条“路”，有时在你人生地不熟时为你指点迷津，有时为你打开难以求助的门扉，有时贴心贴肺地为你解开迷惑的心结，有时为你陷入困境时伸出援助之手。

一个人在成功之路上，一定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。但是，成功之后，如果他自以为见识过人、能力超强，胜过朋友，跟朋友再也不真诚相待，那么目前无论他有多大财富，结果他的“金山、银山”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因为，如果一个人成功之后见了朋友就躲避，喜欢孤芳自赏地生活，朋友来看他时，不是找个借口不见他们，便是随便敷衍一下，久而久之，会失去朋友。

当然，交友也要慎选择，正如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说的是，良朋益友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帮助，而恶朋佞友却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，甚至引你走上邪路。2000年上任的南斯拉夫总统科什图尼察曾说：“我的朋友给我制造的麻烦，几乎和我的敌人差不多。”因此，朋友之间，要信诚相处，正直相待，君子相交。俗话说，友不贵多，得一人，可胜百人，可喻千古，可益一世。交朋友，谁能交，谁不能交，这里面大有人生学问的。总之，“结交莫学三春桃，因风吐艳随风飘。”这是交友的准则。

参军打日寇

孙克文

康，还有烫金车间的工友林宝兴，其他人都不认识。

上船后，我们三人在一起，为保密谷福康让我们改了名字，商议了一下后决定我叫孙克文，林宝兴叫林克武，谷福康叫谷克斌。我们害怕掉队，三人都时刻盯住一位穿长衫中等个子的人，他是我们的带路人。

大约乘了两小时左右的轮船，到了苏北靖江码头，穿长衫的带路人第一个上岸。有一个伪军在检查，带路人塞给他一沓钞票，这个伪军连看也不看就让我们上岸了。我们一行上海人，脚穿着皮鞋，身背着行李，一步步紧紧地跟着走，一下子走了约十多里路，到了一个村子。平时大家没走过农村的土路，一脚高一脚低，累得满头大汗路也走不动了。不一会儿村

子里跑出来一群人，个个都是年轻小伙，嘻嘻哈哈地叫了起来：

指导员，这次上海来了多少新同志？一边说一边帮着我们拿行李，并连连对我们说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我们感觉既新奇又高兴，看着战士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，像兄弟亲似一家人，在上海那种愤懑压抑的心情

一扫而光。这时我才知道那位穿

长衫的领路人是新四军五十二团三连的孙副指导员，他是部队派来的扩军工作人员。

第二天分配我下连队，听同志们说我们连长名字叫钱青，他打仗勇敢，冲锋在先不怕牺牲。指导员给我们介绍部队情况时说：“新四军官兵平等，我们的司令叫司令员，政委叫政治委员，烧饭的叫炊事员，吹号的叫



应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之邀，遂有今秋德国行。短短10天，我们这个新闻代表团访问了30多个机构，可谓马不停蹄。其中有两所记者学校，引起我格外关注，因为这种培养记者的方式，很值得借鉴。

在柏林市区的一栋老公寓里，柏林记者学校的11位学生和几位兼职教师已在大教室等候我们。

校长首先介绍了学校的历史。柏林记者学校是德国新教传媒学院的一个分校。德国新教传媒学院创建于1949年，是联邦德国最早培养记者和供记者进修的传媒学院。学院的创建者是一些经历过纳粹时期新闻强制性一体化的记者们，办学宗旨是促进新闻事业，提倡新闻工作者的刚直不阿，独立工作能力和责任心。1973年起，学院附属于德国新教新闻联合会，大部分经费由教会承担，1995年又在柏林成立了这所记者学校，从此开始了有系统的媒体教学工作。

座谈开始，一位女学生首先用中文致欢迎词，非常热情友好。然后开始相互提问。我所在的报社正在实施新闻岗位培训，所以比较关心他们的课程设置。师生们介绍说，他们的教学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课堂内外交替，一年半学制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：第一年的头8个星期学习报纸新闻理论和编辑，接着是4周实习；然后是第二次学习报纸新闻理论和编辑，接着是一次较长时间的社会调查。以后分别安排广播、“在线新闻”（网络新闻）和电视方面的理论学习和实习。

学校特别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，如排版艺术、标题创意以及如何在不损坏原文风格的基础上润色文章。

德国的记者学校

学业结束时，没有毕业考试，作为毕业作品，每个学员写一篇较长的报道文章，然后授予毕业证书。这张证书并不代表学历，但可以替代两年的实习经历。在德国，要成为媒体的正式成员，一定要具备两年媒体实习经历。

临别时，校长送给我们一本历届毕业生作品选集，5届毕业生每届选两篇。每一届都有一个主题。如第一届学生于1996年到波兰考察，第二届到罗马尼亚，第三届到波罗的海东岸三国，第四届到匈牙利，第五届因经费问题没安排出国，因此学校选出了一个范围较大的选题：“东欧人在柏林”。

德国的记者学校一般都有强大的机构来支持。譬如我们后来访问的汉堡记者学校，就是由三家大牌媒体支持的。学生不用交学费，每月还有750欧元生活费，所以生源充足。每届招15名学员，报名人数超过2500人。经三轮筛选，最后80人入围，然后再考三次，一次是知识考查，展示60张不同的图片，看图说事。然后是能力考试，随机安排采访活动，回来写报道，5个小时后交卷。最后是面试，三人一组，面对10个有经验的编辑提问，最后选出15个佼佼者入学。招收学员不看学历，唯才是举。不过大多数报考者具有大学甚至研究生学历。基础好，培训得法，所以学员的出路不成问题。汉堡记者学校的校长自豪地说：“在他们560名毕业生中，已产生了42名总编辑，近100名副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。”

重实践，重技能培训，特别是写作能力的培养，可以说是反复锤炼，这是记者学校胜过全日制大学新闻学院，受到德国新闻界普遍欢迎的原因。

近日，书法家朱亚东写了一幅长达二十多米的小草书长卷，其实，我并不感叹其作品之长，而是其书写的神定气闲、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，从头至尾温文尔雅、简约凝练的书法风格，令我刮目相看。

回想起来，亚东和我，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。那时的他，有幸得到了高人朱卓鹏先生的指教，学习书法十分勤奋，写得一手好字。

亚东出名较早，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记得1986年拍摄《孙中山与宋庆龄》《家春秋》等电视连续剧。剧中所涉的店招、匾额、楹联、中堂，乃至当铺告示、药店柜名、车站站牌、人力车夫号衣，各式字体，大者逾尺，小仅蝇头，所有场景书法之作，都出自亚东一人之手。电视剧播出后，亚东的书法立刻在同道中引起反响，并波及海外。日本建筑专家筱原康雄先生见了亚东的书法，心生欢喜，并积极推介，日本一些社会名流，都收藏其书法作品；1988年，亚东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个人书法展，反响热烈。社会贤达和书画名家多来观展，欣然题词，以示鼓励。

那时的亚东和我，相互之间走得颇勤，经常在一起交流书艺。后来，他下海经商。我们的交往也逐渐少了，只听说他搞过公司，开过厂，起起伏伏，搞得很吃力。尽管他在经商的浪潮中，游得精疲力竭，心力交瘁，但我想，这也许是一笔宝贵的阅历和财富，或能使他对人生的幸福和痛苦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即所谓的“苦彻成珠”。

近年来，亚东已从商海中爬上岸，闲居在家，一心从事书法。于是，我们的来往又多了起来。

算起来，亚东已过“知天命”之年。其间，无论是从事书法艺术，还是下海经商，都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。然而，按池田大作的说法：“在考虑人的幸福时，最重要的是，内心的满足、内心的丰饶。”如果只是从财产、地位和名誉这些外在的东西去追求幸福，内心就永远脱离不了“饥饿的泥沼”。现在的亚东对此的认识，恐怕比我们的理解要更深刻了。

“书，心画也。”当下的亚东，认为幸福就在自己心中，所以从向身外寻求转向了对内心的反省，并把书法作为修炼心性的载体，于是又一心皈依书法。他已经厌倦浮华，趋于淡静，甘于寂寞，专注于艺术的探求，从书法的角度来凝视人生。近来作品的内涵也丰饶了起来，这从他所书的宋人张舜民《村居》的作品中（见左上图），可窥一斑。

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
《我的教导员
汤江声》

